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政治

大国策

为中国策

为国是谋

新一轮“赶考”

主 编 唐 晋
执行主编 谈火生 袁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国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强国之鉴 在止于至善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政治

为国
策

为中国策

为国是谋

新一轮“赶考”

主 编 唐 晋
执行主编 谈火生 袁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 新一轮“赶考” / 唐晋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6

ISBN 978-7-80208-907-5

I. 大… II. 唐…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②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IV. D616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142 号

书 名：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政治 新一轮“赶考”

出版人：董 伟

主 编：唐 晋

责任编辑：周海燕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14

网 址：[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20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8-907-5

定 价：49.80 元

法治成就大国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尤其是正义的法律之治，它的国土再大，人口再多，资源再丰，历史有多辉煌，文化有多灿烂，人民有多勤劳，这一切的一切，不

过是人家或列强口中的尤物。

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寻求法治国的挫折史。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老大的帝国逐步崩溃了,但如何重新建设一个共和国,却是歧路复歧路。我们有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吁,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认为,强国梦的关键在于法治,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

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凝聚力,有支撑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真正的持续强大的国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暂的所谓一时之强国,必定是一个法治国,法治不但可以维护和保障一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树立国家的权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法治与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法律才能防范他人或政府的恣意侵犯,为人民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规则与秩序。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凡是法治优良的国家,人民追求财富的合法欲望不会受到压抑,私人财产受到严格保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在有效法律的调节之下健康而有序地发育和成长,经济和贸易必定繁荣兴旺,充满活力。

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的国家,但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权威的,也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强国,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有限君主专制时期就是如此。当然,如果能够继承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那么,一个自然禀赋上具备了大国条件的国家,就必定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强国,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充分享受了作为大国国民的自由、福祉和荣耀。因此,他们发自内心地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祖国,可以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祖国牺牲,这就是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其实,这种爱国主义可

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正像西塞罗所指出的,罗马人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与其说是对于它的国土,不如说是对于它的法律,对于共和国的政体制度。这种宪法爱国主义与近代日耳曼国家的基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思考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家,我认为,法治国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更具有本质性的积极意义。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要说,我们不缺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五年纲要和十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的恒久的建设目标。

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便成为首要的国家主题。法治昌明,政体稳定,人民才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恒心,国家的税收才源源不断,公民美德才得以光大。对此,休谟曾经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们经常谈到大国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大国或超级大国对于今日世界的基本承诺。随着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内政还是从外交来说,国家责任都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中心课题,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国是实现国家责任的基础。在国内政治领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领导者,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责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有义务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宁,有责任和义务惩治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关于中国威

胁的论调甚嚣尘上,对此,我们虽然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方略,但国际社会的担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关键是法治还没有落实到位,也就是说,由于怀疑我们还不是一个法治国,所以对于我们的承诺,国际社会还大多视为政治上的修辞。

其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对于我们不仅具有内政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在当今世界,所谓大国责任,最基本的是意味着法律上的责任,即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它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存在,一个遵循法治的国家,才可能是负责任的,否则无论如何表白,都具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因此,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关键在于要切实地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就近代世界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两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开战的事件,所以,所谓民主和平论就成为了当今和平论的一个主流理论。无论从近期的国家事务还是长远的民族未来来看,世界和平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法治国的建设置入国际环境的大背景来考虑。

当然,中国在国际事务做负责任的大国,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一致,也不意味着非要与美国对抗。关键在于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意识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利益,是法治下的国家人格,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要警惕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另一种是极端的亲美主义。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盲目的、幼稚和非理性的。政治是一种审慎的技艺,需要政治上的实践理性和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国坚定不移地走法治国家的建设道路,我们就有可能建立国家的自主性,从贫弱的大国走向富强的大国,走向对内对外都负责任的自由的大国。

目录

CONTENTS

法治成就大国

-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 001

第二次“赶考”，考什么？

1949年中共中央迁进北平，毛泽东喻为“进京赶考”。60年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第二次“赶考”，考题有二：如何化解治乱兴亡“周期律”？如何在日益多元的环境中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这两个考题没有标准答案，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没有先例可鉴，解题思路寓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之中。

- 制度整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使命与战略 林尚立 / 002
-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 胡 伟 / 015
-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乔耀章 姚尚建 / 024
- 法治政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宋玉波 刘永恒 / 036
- 政治改革政策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 徐湘林 / 045
- 政府何为？
- 中国政府改革的定位、状态与类型 任剑涛 / 059
- 从改革的三次争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奏 郭忠华 / 076

官多公仆少,何解?

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膨胀,不仅表现为绝对数量过大,还表现为“结构性过剩”和“功能性过剩”。一方面“服务性”公务员数量不足,另一方面“管理性”公务员人浮于事。文化根基中的“官本位”思想,让许多人混淆了“官员”和“公仆”的界限,也让政府机构陷入一个“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官员规模 孙 涛 / 085
-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 朱光磊 张东波 / 100
- 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及其原因 方福前 / 112
- “官民比”省际差异原因 张 光 / 124
-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 朱光磊 李利平 / 141

让腐败分子腐败不起

寻租性腐败是腐败现象中危害最大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大量的制度租金,而且租金不高,腐败分子可轻而易举地完成某种交易。制度创新、权力制衡能够加大寻租的成本,减少寻租的收益,让腐败分子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腐败不起。腐败并非只是道德和教育问题,更是制度设计和执行问题。

-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 何增科 / 154
- 过程防腐: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
..... 朱光磊 盛林 / 182
- 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 蔡雪冰 罗小光 / 193
- 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及其制度设计 高国舫 / 200
- 党政干部“逆淘汰”现象透视及矫正 高国舫 / 211

人均 3 000 美元,是第一道坎

发展和稳定是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在人均 GDP 达到 1 000 美元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巴西、阿根廷、印尼等国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最终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人均 GDP 已超过 3 000 美元,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风险将如何释放,如何化解?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内地国家与社会关系

..... 康晓光 韩恒 / 221

政治变革的社会风险

..... 柳建文 / 233

资源性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于立 王立军 侯强 / 243

政府管制、收入差距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 杨天宇 / 254

市场条件下中国的阶层分化与劳资冲突 石秀印 许叶萍 / 266

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 肖唐镖 / 294

第二次“赶考”，考什么？

1949年中共中央迁进北平，毛泽东喻为“进京赶考”。60年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第二次“赶考”，考题有二：如何化解治乱兴亡“周期律”？如何在日益多元的环境中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这两个考题没有标准答案，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没有先例可鉴，解题思路寓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之中。

制度整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 使命与战略

林 尚 立

稳妥而有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一定是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30年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展开的。改革是中国的一场革命,不仅体现在改革本身,而且体现在改革所力图达到的目标,即把中国全面引向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决定了基于改革与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整体建构。所以,改革与发展在一定的时候必然要从局部的改革进入到整体的“立新”阶段。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启动了整体“立新”工程,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将改革的逻辑与建设的逻辑有机统一起来,将建设的逻辑贯穿在改革的行动中。十六大之后,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建设的逻辑与结构,先后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并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框架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新国家建设框架。可见,十六大之后的中国建设与发展进入整体建设、整体协调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把中国发展推进到这样一个新时期。然而,这个新时期只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下的重要使命就是如何在新阶段开辟出党和国家发展的新境界,从而把中国的发展全面提升到使国家和民族得以全面复兴的新水平。为此,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由此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整体战略。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党的有效领导,而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党的有效领导必须建筑在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是新时期党建的新战略。本文将从党所推动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目标与战略，来把握新时期党建的使命与战略。

用党的建设推动国家建设：中国的战略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这个潮流。各国进行现代化努力的路径和过程可以不同，但不可能因此而背离现代化对各国成长的内在规定性。首先，就国家建设来说，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近代以来，许多国家都以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其次，现代化意味着所建立的主权独立国家是以民众的政治解放为基础的国家，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与传统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有本质的不同，它实行的是民主共和。所以，现代化的国家建设一定是以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取向的。最后，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建设最终能够给这个社会和国家一个长久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稳定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体系。这个稳定性和持续性“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切比较基本的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可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建设的核心使命就是三个：主权独立、民主确立、制度屹立。这三个使命的实现是相互关联、循序渐进的。没有主权的独立，也就不可能有民主的确立；没有民主的确立，也就不可能出现制度的屹立。显然，国家建设的最高境界就是制度的屹立，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获得有效的权威，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另一方面是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契合，获得广泛认同，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这个角度透视当下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方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应当是：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确立起一套能够屹立不动的制度体系，以保证国家的全局稳定、持续发展、和平崛起。

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国家建设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动发展及整体推进。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改革开放创造的现代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孕育出了现代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同时,也把中国的国家建设从追求主权独立、民主建设推进到对制度屹立的追求上。因而,进入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建设过程,实际上是实现国家全面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动发展及整体推进的“四位一体”国家建设,是国家制度体系得以稳固确立和全面健全的根本。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制度创新、制度积累以及制度完善,则是保持“四位一体”联动发展及整体推进的基本保障。

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在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体系。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现实,是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的意志决定的。基于这样的现实,党的有效领导也就成为推进国家建设的关键。然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既是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也是运行国家制度体系的执政力量。所以,党的有效领导,不仅体现在党用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规划来领导国家建设,而且体现在党能够在运行国家制度中直接赋予国家建设以动力与资源。为此,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行动战略。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是实现拥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制度化国家的关键。可见,在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中,党的建设获得了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使命与功能。在这样的情势下,今天的党建就不是仅仅为实现长期执政而进行的党建,它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建设能否最终达到目标并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显然,这种党建在关系到党的长远发展的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这种党建不能仅从党的空间出发,还必须从国家和社会的空间出发;不能仅考虑当下,还必须考虑长远。

用创造性党建统一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价值、组织与制度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角色:领导的角色和执政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责任以及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建设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其领导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是以领导力量的角色而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力量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人口规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发展压力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全面迈向现代化,首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必须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领导的合法性,其根本是拥有雄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被最广大的社会力量所认同;其二,纲领的科学性,其根本是党的指导思想和治国纲领既先进又可行,能够产生实际的社会发展效应;其三,组织的整合性,其根本是党的各级组织不仅能聚合党员而且能聚合社会,从而通过党系统的组织网络体系将国家与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四,制度的合理性,其根本是党自身拥有一套先进的制度体系并得以有效运行,保障党的领导拥有强大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制度能力。

显然,构成党的领导力的这些要素不可能在党的空间形成,其中的不少要素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空间中完成。从这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党自身努力实践、不断奋斗所获得的,而这种实践与奋斗的根本前提就是党时刻保持与国家、社会的有机互动,并保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也就是说,党要对国家、对社会保持强大的领导力,就要保持党对国家、对社会来说始终是一个先进的因素和先进的力量。为此,党就必须在自我建设中把保持其先进性的建设放在首位。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党一旦落后于社会发展,就无法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先进因素和先进力量,也将在国家领域中失去其原有的先进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强调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这就决定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

中国共产党目前所拥有的另一个角色,即执政的角色,是中国共产党成功

领导中国革命并掌握政权成为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党以后获得的。可以说,执政角色的获得,是党成功领导革命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是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党,是具有高度先进性的政党。但是,领导革命与领导执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导逻辑。领导革命的逻辑基点在于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有效的组织整合;而领导执政的逻辑基点则在于高度的合法性与有效的制度体系。这其中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其应有的先进性,就不仅要在巩固和发展原有的先进性基础上,根据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造性地进行保持先进性建设,而且要将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统一起来,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要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在领导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活动中展开的,在目标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但在行动上并不是固守性的行动,而是一项创造性的行动。所以,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创造性建设,即在党的创造性建设中,巩固党的先进性、创造党的先进性。

政党的先进性支撑政党的领导力,而在执政条件下,政党的领导力要转化为实际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就必须体现为具体的治党、治国、治军的能力,即执政能力。也就是说,作为全面领导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来自其整体的先进性,而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则有赖于执政能力的完善和提高。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着政党的领导地位与领导权威,而政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着政党的领导能力与领导成效。所以,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要成功领导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就要将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有机统一。这种统一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党的先进性,因为有了先进性,政党也就有了运行国家制度、领导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从而保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的最终归结点还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但执政能力建设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指明了行动方向,即在执政的逻辑上巩固党的先进性、创造党的先进性。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任何政党要获得稳固而有效的执政,其基本要求不外乎三个:其一是合法性,即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依法掌握国家政权,依法治理国家;其二是有效性,即有效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使得这种发展造福全社会,而不是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其三,整合性,即协调多元社会利

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合作与团结。这三大要求决定了党要在执政的逻辑上进行先进性建设,就不能局限在党自身的一维空间中,相反,必须在党、国家、社会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展开。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社会,国家在适应这种经济与社会变化过程中也日益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所以,这个三维空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一个新结构的空間,而且是一个新发展的空間。党要在这样的新空间中巩固其先进性、创造其先进性,就必须进行全面的自我建设和发展,即在价值、组织和制度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创造性的党建。

在价值建设方面,要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有先进的执政理念,能够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and 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的政党。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有意义的价值、理论与思想。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能够凝聚大规模党员、服务大规模民众、整合大规模社会、推动大规模发展的政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党的组织体系重构,党的组织功能开发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再教育、再组织和再动员,从而全面活跃党员、干部与组织,使其全面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发展。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能够用制度治党、用制度固党、用制度强党的高度制度化、民主化和一体化的政党。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党内全面确立党章与制度的权威、完善党内制度、运行党内民主、规范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从而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化水平、民主化程度,强化党的整体统一性与完整性。上述三方面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很大的创造空间,在相互作用中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不能是就事论事的党建,而应该是创造性的党建。科学发展观为这种创造性的党建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

创造性党建的战略基点:制度整合发展

之所以把新时期党建定位为创造性党建,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新时期党建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就环境而言,新时期党建面临着基于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新的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国际环境和基于市场化而形